◆专家视点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创新

编者按：山东省委党校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研究》期间，咨询了不少党建专家。课题参与者衣芳教授与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的对话，对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有一定启发。以下是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谭建记录的对话内容。

高新民：党群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党与不执政的党地位不同，群众对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有了成绩群众会归功于党和政府。但出现问题和失误，群众不满意时，同样会归咎于党和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党群关系仅仅是政治过程的结果，是党和政府方方面面工作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群关系蕴含于党的各项工作之中。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会影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因此，现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比之不执政的时候更加重要，其影响面更加宽泛。

衣芳：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十分重视党群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从作风建设、群众观念、群众工作、群众路线、群众立场等角度都多有涉及，并且特别重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建设问题。我们山东省委党校也承担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研究》。

对于我们党来说，群众工作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实现方式。我们党现在做的各种工作都需要群众工作，也都渗透着群众工作，只是各个时期群众工作的重点是不同的。

高新民：对于做好群众工作来说，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永远是第一位的。发展经济是社会内在的需求，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党执政的经济合法性的体现。政治统治的可持续与人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可持续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依赖于人民群众，而群众的生存状态又是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参照指数之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做好了经济、民生工作，才能做好群众工作。从政治学上讲，就是在实现经济合法性的同时，实现政治合法性。

衣芳：这是个一般规律问题。任何时代经济和民生既是执政党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所必须关注的重点领域和问题，又是民众幸福生活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密切党群关系至关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握经济和民生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

高新民：经济和民生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最重要。党的政策应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今天的政策就不能照搬改革开放之初时的经济、社会政策。那个时候政策的重点是做大蛋糕。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任何政策都需要依据时代条件适时调整，而调整要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同步发展之上。如果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出现某种问题，致使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却过多承担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那么，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了，党执政的经济合法性似乎增强了，但民心失掉了，群众基础流失了的问题，同样威胁到党执政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时重视社会公正问题。

衣芳：是的，社会公正问题关乎民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正视历史传统、社会心理，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心理；同时，当下社会特征、时代背景，也需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

高新民：促进社会公正，需要公正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而调整利益关系，最重要的是让群众相信执政党和政府能够公正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取得社会信任的基本途径就是公权力自身行为公正，不与民争利。前些日子，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因涉嫌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调查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现有体制下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少人以看热闹的心态对待之。有一些改革推动不下去，其中部门利益起了很大的掣肘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也曾出现过某些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权力的公信力，导致群众对公权力信任不足。公权力不能与民争利，换言之，公权力自身不能成为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一元，是取信于民的最基本的原则。

促进社会公正，为群众服务，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审批机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当下可以做的一项具体改进就是，在对政府官员的任命和考核时，加入一个评价元素，即把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部门的服务对象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迫使其为群众服务。应当从制度设计上促使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解决群众对公权力信任不足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另外，社会各阶层之间互信不足，也是当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群众中普遍弥漫着对富裕阶层的不满情绪，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为富不仁；另一方面社会富裕阶层中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得到社会理解和尊重，缺乏安全感，从而加剧了投资移民倾向。本来，我们党已经在政治上解决了如何对待新社会阶层的问题，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新社会阶层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发展的体现。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体制有活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将社会新出现的精英群体纳入到自己的系统之中。

衣芳：确实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各阶层的互信问题。

高新民：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信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多方面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建设性工作，就是妥善解决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问题，即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的社会阶层之间向上流动的通道。一般而言，教育是一个有效的手段，通过教育使社会底层群众拥有向上流动的必要的知识、技术等。这里实际上涵盖两个问题：一个是持续地推进教育公平化，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另一个是提高群众支付教育成本的能力。这就从教育转化为经济问题了。实现这一点，一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要建立各阶层利益协调制度，制定相对公正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应该依据企业效益、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既让老板有钱赚，又让工人有基本的尊严，能够支付起必需的自身再教育和子女教育成本。利益协调中把握好“度”的平衡，是很重要的问题。

衣芳：我们刚才谈的这些问题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党群关系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制度，要把群众工作制度化，就是把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为党的群众工作制度规则。群众工作的制度化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长久推动力。当前，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如干部联系点制度、进村入户制度、民情恳谈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当前党群关系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应急性制度多、目标性制度少，单一性制度多、整体性制度少，特定性制度多、普遍性制度少，治标的制度多、治本的制度少等问题，因而制度的有效性受到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您认为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党应该做哪些工作？

高新民：要加强制度的整体设计。目前，对于“整体设计”如何设计，以及设计的内容是什么等问题都亟需形成共识。至于整体设计的原则应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渐进改革原则，要把渐进式改革与不失时机、有重点地突破结合起来；二是整体性原则，宏观规划、有步骤改革；三是务实性原则，实事求是，寻找改革最迫切、最急需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交集点；政策的连续性、相对稳定性原则；自上而下指导与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原则。

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再加上目前各地各级各方面诉求的碎片化，因此，应建立一个协调、整合机制，要有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的部门机构，设计、主导、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让我们看到了中央的远见卓识。

建立联系通畅的社会沟通机制和党内沟通机制。如果没有政治沟通和政治反馈机制，或者这种机制不够通畅，就会导致不能提、不敢提反对意见，使得真实的意见反映不上去。结果往往是只有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政治才有所反应。我们当前进行的大接访、大调解是化解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但必须注意大接访、大调解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我们要靠建立常态化的社会沟通和党内沟通机制来解决。

建立科学的权力授予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以及决策机制等。权力授予机制方面，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通过党内民主的扩大来确定选拔出符合民意的干部。权力制约机制方面，一要努力做到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二要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社会监督。在决策方面，在多元利益时代，在公民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应使利益相关方全参与进来。决策过程博弈越激烈，政策就越趋中。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决策，既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同时也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

科学地比较中国与世界

□陶文昭

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看待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并将之科学地比较，有几个问题值得探究。

端正的目的。究竟出于什么样目的去做中外比较，很有讲究。怀着先入为主的好坏结论，这样的比较动机不纯，方法就会变形。譬如为了说明外国比中国好，可以找出外国各种好的事例。同样，为了说明中国比外国好，也能找出中国的各种闪光点。这种为了说明一方的好坏而选择性地比较，显然是不科学的。目前的舆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刻意抬高或贬低某一方倾向，有的试图通过带有倾向的比较以唱衰中国、美化外国。每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世界上不存在一无是处的国家，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国家。我们比较中国与外国，当然为中国的成就辉煌而自豪，为中国的道路正确而自信。同时，我们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都要积极关注，坚持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平等的立场。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有大有小，有富有穷，有强有弱。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实力主义乃至丛林法则。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主张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和完全平等。比较中国与世界，既不要居高临下，动辄指责别的国家，搞唯我独尊；也不要自我矮化，仰他人鼻息，未言而先怯。中国近代以来曾屡遭列强欺凌，遗留下了一些自卑的阴影。而当今中国实力的增强，滋长了一些自傲的情绪。在社会舆论中，自卑和自傲都一定程度存在着。然而，不卑不亢是我们应持的基本立场。我们强调三个自信，同时保持自谦和自省。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世界是个大家庭。我们希望中国好，但不必通过贬低外国从而抬高自己，不以他人为踏脚石。我们也希望外国好，大家都好才是真好。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融通，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正是传递着这样的理念。

平和的心态。当今世界舆论表面纷繁复杂，背后却是西方的主导和操纵。国际上有许多对中国的非议，对此我们不回避中国的确存在着诸多的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但是要看到，中国与自谓世界主流的西方社会制度不同，中国崛起正在引发国际格局因而也是国际利益的调整。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遭遇对手更多的责难是毫不奇怪的。世界历史中，无论是新的制度还是新的大国，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中国经历过挨打的阶段，还要在成长之中经历挨骂的阶段。对待外界的非议，既要警惕其背后的用心，做一些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击，但也不必看得太重，凡事都去计较，因为靠吵架是吵不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之，学会在别人挑剔声中聚精会神、排除干扰，坚持走好自己的路。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进而让世界更客观地认识中国。

科学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中国也是复杂的。比较中国与世界，要全面地分析，辩证地把握。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硬拿中国每个方面的指标与世界各国最优的指标比较，如福利与瑞典比，环境与加拿大比，科技与美国比，守纪与德国比，廉洁与芬兰比，显然中国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不过。但这样比较是不科学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各个方面都占据鳌头。即使是全能冠军，也不能保证在各个单项上都是冠军。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指标都可能处于中下游。中国还在发展的路上，我们争取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在努力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在局部方面率先看齐，进而在未来实现整体性的超越。

◆新时期论坛

以“三个解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康 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三个解放”既是我国长期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三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深刻揭示了改革的本质和规律，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抓住的关键点和着力点。

解放思想是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既能为行动注入强大的动力，又可能成为行动的巨大阻力。纵观人类社会每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重大历史进步，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思想解放及其形成的先进理念和认识，为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方向指导和理论武装，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解放思想是前提。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只有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大胆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36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每当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是思想解放廓清了认识误区，也是思想解放引领了改革潮流。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由此引发的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南巡讲话消除了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的疑虑，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形成；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打破了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势，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改革在新的阶段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可以说，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推动着改革开放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反之，没有思想观念的突破，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

当前，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对各种险滩和难啃的硬骨头，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就必须更大幅度和更深层次地继续解放思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只有物质生产发展了，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活动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

邓小平精辟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改革是非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首要的标准。他还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亲自领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从联产承包、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始，一步步向各个领域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八大首次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要求”之一来论述，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实际上是改革的最终价值追求，也就是改革的最终目的。但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就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只有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社会财富才得以极大丰富，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强调要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关键

社会活力是社会有机体生命力的重要标志。社会活力的不断增强，既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也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社会活力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被充分激活，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直接构成要素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效用得以充分释放，作为社会制度层面的体制机制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社会就生机勃勃，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缺失活力，人的创造性被抑制，财富的源泉被堵塞，体制机制被固化，社会就死气沉沉，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在“三个解放”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判断改革措施是否具有成效，主要是看其实施后是否激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力。邓小平指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搞活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从改革的直接目的看，就是要通过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解除思想观念束缚，让社会各主体、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都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当前，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社会流动渠道不够畅通，公平正义问题凸显，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活力，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即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等。

“三个解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个解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相互促进。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突破各种不利于发展的观念障碍，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宽松氛围，形成推动发展的正确导向，从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了，人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得到了实惠，就会更加积极主动自觉地解放思想；同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也能够推动人们“被动”地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相互促进。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和惰性，激发社会主体巨大的内在潜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强大气场，从而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本身就包括思想活力，社会活力解放和增强了，全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更加宽松、自由、大胆创新的氛围，人们的思想禁锢被解除，就会以更加宽容、更加理解、更加崇尚的态度倡导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相互促进。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一切社会活力之源，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创造活力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永不停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充满创造活力的过程。社会活力的解放和增强能够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形成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三个解放”有机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深化改革推动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又为深化改革提供精神动力。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物质基础。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社会活力的增强又反过来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做到“三个解放”，以“三个解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